

翰林外史

连载二

统计学家许宝騄与昆曲

未铭

在北大数学系的历史名人中，许宝騄（1910-1970）是名声显赫的一位。他 1910 年出生于北京，原籍浙江杭州，祖父曾任苏州知府，父亲曾任两浙盐运使，系名门世家。兄弟姊妹共 7 人，他最幼。其兄许宝驹、许宝骥均为专家，姐夫俞平伯是著名的文学家。

许宝騄获得清华大学数学学士，伦敦大学博士。1947 年前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任教，之后一直是北大数学系教授。钟开莱、王寿仁、徐利治等均是他的学生。他是中国概率论、数理统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先驱。在内曼—皮尔逊理论、参数估计理论、多元分析、极限理论

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，是多元统计分析学科的开拓者之一。他于 1948 年和华罗庚、陈省身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数学院士。

今年 9 月 3 日，北京大学为数学学院许宝騄教授举行 100 周年诞辰纪念会。这不由使我想起一段在燕园流传甚广但是未经证实的爱情故事。故事原版大致如下：话说上个世纪 20 年代，三位青年才俊正是风华正茂之年，一位是学习经济学的，一位是学习物理学的，一位是学习统计学的，互相是好朋友，当时经常把臂同游，正准备出国留学。他们同时结识了一位娇小玲珑恬静优雅的妙龄女郎，姓王。更为



一代数学大师许宝騄

巧合的是，三人都喜欢上了她，想得到她的芳心。这位女郎见三人才貌品德学业均为优秀，无分上下，不好决断。于是说，你们出国留学，谁先取得学位归来，我就嫁给谁。结果三人均出国留学，取得优异成绩，成为本专业领域的翘楚。其中一位物理学家和王女士同结百年之好。另外两位终身未婚。还有一个版本是，王女士其实一开始就看上了那位物理学家，但是不好意思伤害另外两位才俊，只好有此一说。

这三位当时的青年才俊，一位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（原北京大学校长），另外一位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（原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），第三位就是今天我们要纪念的著名数学家许宝騄教授。

许宝騄不仅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数学家，还是一位有很高造诣的昆曲爱好者。受家庭熏陶，他精善音律，爱好昆曲，工昆旦兼习小生。1935年初，与姐夫俞平伯共组清华谷音社，是主要成员。解放后，在教学科研之余，经常参加老君堂俞宅昆曲清唱和北京昆曲研习社活动。下面是1941年作家老舍记载当年抗战时期在昆明生活的《滇行短记》中的一段：

“住在靛花巷的，还有郑穀生先生，汤老先生（注：即汤用彤先生，著名哲学家），袁家骅先生，许宝騄先生，

郁泰然先生。

穀生先生是历史家，我不敢对他谈历史，只能说些笑话，汤老先生是哲学家，精通佛学，我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，没有看懂，因而也就没敢向他老人家请教。家骅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，一天到晚读书，我不敢多打扰他，只在他泡好了茶的时候，搭讪着进去喝一碗，赶紧告退。他的夫人钱晋华女士常来看我。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。宝騄先生是统计学家，年轻，瘦瘦的，聪明绝顶。我最不会算术，而他成天的画方程式。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，即留校教书，我想，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！假若他除了统计学，别无所知，我只好闭口无言，全没办法。可是，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。在昆曲上，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‘老师’。罗先生学昆曲，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，属于那声的宇容或有一定的谱法，虽腔调万变，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。钱女士学昆曲，因为她是个音乐家。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，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。可是，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，天天说拍曲，天天一拍也未拍，只好与许先生约定：到抗战胜利后，一同回北平去学，不但学，而且要彩唱！郁先生在许多别的本事而外，还会烹调。当他有工夫的时候，便作一二样小菜，沽四两市酒，请我喝两杯。这样，靛花巷的学者们的生活，并不寂寞。当他们用功的时候，我就老鼠似的藏在一个小角落里读书或打盹；等他们离开书本的时候，我也就跟着‘活跃’起来。”

根据老舍的回忆，连专门的音乐家都向许宝騄先生请教，可知他的昆曲的水平是相当专业了。



老舍(1899-1966)对许宝騄先生的昆曲水平极为赞赏

科学院故事之钟家庆与蹬三轮的

萨苏

钟家庆研究员和萨爹曾是课题搭档。钟为人侠义正直，敢说敢为而又懂得办事的方式方法，在和上上下下相处时锋芒毕露而又游刃有余，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活跃人物。与学问还不错，但寡言少语，一开口就和邓小平同志叫板的萨爹搭档，正可以弥补他的缺点。

钟性格上的优点不仅表现在社会活动中，而且在对待朋友上也有两肋插刀的豪迈，这一点他有本钱，钟的手巧，身体也好，体格强健，而且他很愿意帮朋友作体力活。

这在今天想想觉得不可思议，可是我小时候就是看着这些所谓的数学家每天干体力活，很平常，比如龙瑞麟先生，经常要趴在那儿给儿子的自行车补带，他的手艺之好，以至于我家的自行车出了毛病，也要麻烦他。忽然想起，龙先生的小儿子龙川，现在也在美国读完数学博士学位了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头发灰白的父亲猫着腰给他修自行车的样子。

张广厚先生去取牛奶，章兆旨先生借房子接待外宾，这都是真实的事情，我亲眼看着的，所以我始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信任。

不说这个话题了，容易伤感，说钟家庆先生吧。

文革期间，萨爹在东四盖小厨房，数学所里支援他几根大木材，每根都海碗口粗，两丈多长，这可怎么往回送？

钟先生说，没问题，咱俩送吧。

于是这哥儿俩就在自行车后架子左右各绑一根大木头，仿佛两根旗杆，钟先生打头，萨爹殿后，威风凛凛地出发了，那时候北京还没有那样多的电线和汽车，就这样居然花了两个钟头，从中关村骑到了东四……

我记得钟先生，并且感激他，其中有自己的原因。

上中学的时候，萨爹不在国内，萨过马路不小心，和北京市公共汽车中最大的332路来了个亲密接触，直接进了车底。（萨这个故事至今是北京人大附中进行安全教育的经典案例。）

出事后，数学所的同仁们仗义相助，龙瑞麟先生的夫人高老师干脆搬过来住，陪着萨娘照顾萨这个惹祸精。那时候来了不少应该记住的人物，

比如，大冬天的有一天来了一位先生，身穿极精神的一身西服，在寒风中泰然自若，后来随口一问，原来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的大学生，数学家毕大川！大概他们老家黑龙江零下三十度的气温对他很平常，北京的冬天，只能算是“凉快”吧。

从医院把我送回家，汽车开到数学所平房前面，因为有一片小松树林，过不去了，大夫说怎么办？要不弄个担架？



著名数学家钟家庆的雕塑。屹立在其母校校园里。